

脑血管后遗症使得我经常头晕，两年了不能写作。今年秋天我就来到山东龙口养病，为的是这里海边的氧气足。这天上午接到一个女孩的电话，可我问她，听不清她说什么，让她给我写短信。一会儿短信来了，先说是某报文化记者，可后面的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她问我可知马悦然先生有不幸的消息吗？我赶快简单回复问，什么不幸消息？她说你和马悦然先生是好朋友，你也不知道这事，那但愿是误传吧。

马悦然的中国缘

曹乃谦

这时有我猛地想起什么，赶快开电脑，一下看到有文芬的信。我的心咯噔一下子就快速地跳起来，颤抖着手点开信后，看到的是“悦然今天下午三点半在家过世”。

我都不知。我在这里养病，真的是经常不知道今天多会儿。我电脑快坏了，经常黑屏。这又黑了，当我把视屏弄亮，才知道今天是10月17日，可这时又看见文芬的一句话：“我想起来，今天就是我们在你家订婚的日子。”

我赶快划开手机点开日历：10月17日，农历九月十九。

啊！九月十九！我再次大声“啊”地叫起来。十四年的那天，2005年的那天，农历九月十九的那天。

那天早晨我上街买菜，发现街面上比平时多了好多家卖香火的摊子，而且是人拥人挤的，生意很旺。我好奇地向一个刚买了香火的老人打问，他的手向上指指说：“你不看，天蓝蓝的，是个好日子。”见我还不明白，他又说：“今天是观音菩萨

的成佛日，是个喜庆的日子。”竟然有这么巧的事。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和台湾的文芬女士，还有我的好朋友李锐和蒋韵四位贵宾今天要来我家作客，正好就遇到了这么个喜庆的日子，真是有缘。

就是那天，我在客厅饭桌摆杯盘碗筷，悦然推我胳膊：“乃谦，你给大家把酒倒好，我有话要说。”我以为他是想要在吃饭时跟大家碰碰杯，再说点什么话，我说：“没问题。”说完，继续忙我的。可是不一会儿，他又揪揪我衣服说：“乃谦，你给大家把酒倒好，我有话要说。”我抬起头问他：“现在？”他连连地点头说：“对。就是现在。”

我算了算，连妻子和请来开车的司机，屋里八个人。我一字排好八个高脚杯，打开啤酒，连沫儿带酒把杯子都加得满满溢溢的。这时，文芬也出来了，她进厨房去请我妻子。我妻子说你们先喝着，我忙完就过去。文芬说：“请你也过来。你得过来，悦然要训话。”我妻子听说悦然要训话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出来了。

悦然面对着大家站着，文芬靠在他的身边。悦然看了看墙上的壁钟，又转过身看着大家，没做声。大家静等着，等着他的训话。

悦然又看钟表，我也跟着看看，正是中午十二点整，他开口了。说得很慢，表情严肃、激动，他说：“现在，我当着各位朋友的面，宣布，”说着，他的左胳膊把身边的文芬搂搂着，“我和文芬，相爱多年，今天，我要在各位朋友的见证下，正式订婚。”说完，在大家还没想起欢呼庆祝的时候，他把握在掌心的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。紧接着，就是幸福的拥抱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看见，文芬的眼里含着晶莹的泪珠。

蒋韵把提包打开，取出一对枕托，样式像两条弯弯的鱼，古朴、高雅。这是他们给悦然和文芬的礼物。李锐和悦然他们是一起从北京过来的，悦然在北京就把要在我们家订婚的事告诉了他，他就让蒋韵做了准备，可我却事先不知道这件美好的事要在



痴花

蔡皋文/图

天上的云，一抹一抹，有一朵却像鸡冠花一样直了上去。

它那里没有风来吹它吗？

一个种花的人说，我只同种花的人来往。同别的人往来麻烦死人。在花那里，只要你把花好，花就会对你好。种花的人说，人总要点事做，不磨那个空磨子。

看到花和去种这棵花是不一样的。种植可以让你寻思生命生长过程中的种种意味深长，知道这世界上事情都如同种植活动，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
我家发生。文芬解释说：“悦然是怕给你出了难题，不知该如何准备才好，所以我们才没有事先让你知道。”可我该送个什么礼物呢，想了想，家里也没有什么合适的。蒋韵说你给唱首民歌吧。可这能叫礼物吗？我一下想起，悦然和文芬看了挂在墙上我自己写的书法，都说写得好好。我就说，那我给你们写个条幅，裱好后寄给你们。



“好，好，”悦然说，“对！你就写‘到黑夜想你没办法’这几个字。”悦然还告诉我，他用瑞典文翻译我的长篇小说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》近期就要出版发行。

“哇——到黑夜想你没办法！”大家同时欢呼起来。

热烈的鼓掌。衷心的祝福。酒杯高高地举起。在温家窑，当我看到悦然弯下腰跟围观的孩子们说笑逗玩时，又看到文芬抱起羊羔亲亲它的脑袋时，我就认定这两个人同样有着金子般的真诚善良、宽厚仁慈的心。从今开始，这两颗心脏就要因了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情感而一起跳动。我和李锐夫妇作为证婚人，也为此而感到无比高兴，高兴得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一向不好说话从来不喝啤酒的我的妻子，一口气把杯中酒喝干，激动地说：“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”“对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”大家同声说。

是的，那一天真是个好日子。

可是，十四年后的这天，悦然却是在农历九月十九这个日子，离开了他心爱的妻子，还放下自己热爱了一辈子的中国文学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两个色彩不同的日子都是九月十九？

我老伴说，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这是缘。上一个九月十九，缘让悦然和文芬这两个相爱的人，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结成夫妻。而这个九月十九，缘让悦然在这一天离世，就是为了让他心爱的妻子不要悲伤。

我想了又想，相信老伴儿这种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。要不是的话，谁还能说出另外的让人信服的解释呢？

是的，是缘。悦然虽说是瑞典人，可他和中国有缘。

七十多年前的1946年，当悦然向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中文的时候，就与中国结下这种缘；1948年，当悦然居住在四川峨眉山的报国寺，向果玲和尚学习汉语的时候，就与中国结上了这种缘；而实际上，当悦然在1924年6月6日在瑞典一出生，这种缘就已经开始了，因为那天正是中国的五月初五端午节。

是的，是缘。九月十九，九月十九，这就是悦然的中国缘。

一早在微信上看到朋友发来的一个链接，是关于一位名家纪念馆挂牌的消息，并附言：很痛心。我回信调侃：为什么？嫉妒？朋友答：我没有想到他也会这么俗！

朋友不是嫉妒的人，平日也颇有容人之量，这次我能感觉出来，他是真的痛心疾首。世上的俗人俗事多了去了，各种“名家纪念馆”也多了去了，朋友独为这个“名家纪念馆”“痛心”，盖因那位“名家”曾是他颇为敬重的同行，从来以刚直不阿、清高自负、言行泼辣、眼里不揉沙子的硬汉形象示人，而今这样的形象轰然坍塌，朋友的猝不及防、难以接受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

早年在乡下插队，曾与一位聪敏活跃的同屋私交甚笃。忽然有一天，隔壁有人饭菜票失窃，追查的结果，盗者竟然是我的这位同屋。我与他从此绝交，为此我难过了很长时间。尽管失窃的饭菜票数量微不足道，但我觉得，事情的性质与数量多寡毫无关系。他可以为若无其事，可以照样聪敏活跃，并且后来可以头一批顺利回城，但我却无论如何无法像从前那样毫无芥蒂地面对他，以致不得不在生产队的牛栏边找到一间空置的茅草房，搬出了那间宿舍。

这样近于洁癖的促狭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阅历的增加，多少有了一些改变。比如，尽管我心里明明清楚，以有的朋友的写作成绩，劳神费力地折腾“纪念馆”之类，除了徒有虚名，意思不大。本想直言告知：一个生命的意义，在他出现到最终消失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现过了。该留下的影响自然就会留下，留不下的强留也没用。对当事者来说，“纪念”了并没有增加什么，不“纪念”也不会减少什么。就像北京奥运主体育场鸟巢的设计者雅克·赫尔佐格回答记者采访说的：该说的他的作品都说了。我不以为这是谦虚，因为事情的确就是如此。何况，那些热心给自己建纪念馆的同行远没有雅克·赫尔佐格先生这样足以骄人的成绩。然而，思之再三，我还是答应去捧场。理由有三：其一，只要能让我朋友高兴，我就有义务躬逢其盛；其二，“友直”固然是美德，但有些直言只能限于过从甚密、乐于听劝的朋友；其三——这是最主要的，那就是我以为自己的原则只能用来规范自己，别人未必适用。

同样的例子，在生活中可以举出许多。比如，我觉得写作之外的活动对作家有太大的意义，但这并不等于影响我履行职责，为别的作家操办研讨会之类；因为自己的写作乏善可陈，每因参加活动、出书必须提供简历，我只是提供最基本的信息：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写作时间、参加社团等，但不必等于就要对那些提供了各类荣誉、各种职务的同行不以为然；我成家把两个单身的行李搬在一块了事，没有办过婚礼，没有收过贺礼，但这并不等于我在此前和此后就不给办婚事的亲友、同事、邻里随份子；我自己的名片只有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但并不等于我就要拿那些写满了各种头衔的名片说事；我在人多的地方总是尽可能保持缄默，但并不等于不会盛赞那些口若悬河、妙语连珠的朋友……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、价值观、处世方式、行为准则，只要不构成对他人的恶意伤害，就应该无可厚非。

偶尔看到出于一位特级教师之手的《乌有先生历险记》，其中有“不欲与俗人齿”句，说中山有个普通百姓“乌有先生”，年龄将近七十岁，种植桑麻五谷维持生活，不愿和庸俗的人为伍，别人对他的毁谤与赞美全都不放在心上，人人都把他看作通达事理的人。虽然这是一篇为了帮助中学生掌握文言知识仿古自编的故事，读来还是很受触动。

显然，不与俗人为伍，是人们公认并且历来崇尚的气节。一早给我发来微信倾诉“痛心”的那位朋友，对社会和人生还保有着一颗宝贵的赤子之心。而我那些振振有词的“捧场”理由，不过是一种世故和圆滑罢了。

相形之下，我是应该惭愧的。

不欲与俗人齿

陈世旭



与上海最近的十月

(新加坡)宣轩

10月1日，是学校第四学段的考试日，也是年终考试的第一天。考场上，学生们的脸上挂着掩不住的紧张。但是，我们几个中国老师，却彼此传递着莫名的兴奋：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大家关心的是201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阅兵式。我将手机停留在视频软件的直播，来来回回的监考间隙，都接着看。回家后，又在电视屏幕上放大画面，看个完整。当天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队伍中出现了上海花车，看着那微微挥手、含蓄微笑的上海姑娘时，我不由赞叹，这就是上海的风格呀！矜持而不失友善。

这个十月，我的生活填满了中国红，也头一次觉得自己离上海那么近。国庆前夕，打开智能电视机，关于国庆的庆祝活动视频在网络上频频出现。偶尔点开一个视频，看到的是《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》。平时看电视，那本是睡前的小段活动，那天，我却认真真地看了2个40分钟，将整个颁奖过程看了个仔细。尤其是当我看到我熟悉的杏坛老前辈于漪老师时，更是激动：于老师依然健康，依然有为。于老师坚守中学语文教学60年，让普通变得不普通，是多少师范生的教材，是多少年轻教师的楷模。而我，却有幸与她共事过。

而一场题为《奋斗吧，中华儿女》的文艺演出，更是唱出了我熟悉的大量老歌，从《延安颂》到《我的祖国》，从《祝酒歌》到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似乎把我带回了每周跟着半导体收音机学唱一首歌的少女时代。在张艺谋执导的国庆晚会上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变幻和烟花表演。据悉现场有3000多名群众演员手持光影道具进行组图，那巨大的国旗，那烂漫的图案，大气磅礴，动感十足。高科技的处处存在，让人不得不相信：中国强了。

新加坡不同的电影院线几乎与国内同步上映了国庆大片。于是，我这个影迷便趁着考试阶段学校早放学的机会，在一个星期就把三部国庆片都看了。《攀登者》的催人泪下，《中国机长》的惊心动魄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经典瞬间，让我和影院里很多来自中国的观众们一起唏嘘。走出影院，耳边传来一声声：中国，了不起！

这个十月，我在新加坡观赏了9个与国庆有关的影视歌舞作品，是离中国、离上海最近的一个十月。



夜光杯

我从小爱好就是看书读报写作文，1966年初夏初中毕业时遇到了“文革”，升学愿望破灭，两年后，我被分配到崇明长江农场务农。

从大城市来到偏远农村，尽管有艰苦生活的准备，挑战还是接踵而来。高尔基的长篇小说《我的大学》，描写阿廖沙16岁抱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，把贫民窟、码头、面包房、杂货店当成了他的社会大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农场也是我的“社会大学”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我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，收工回到宿舍，我们传阅从自己家里带来的中外名著，交流阅读的体会。我把床当作写字台，坐在小板凳上写了许多读书笔记，还学写新闻报道，把三夏、三秋中的人物和事写成小通讯、小故事登在黑板报上，并送到场部广播站，初享了“发表”的愉悦。不久，我被提拔为连队副指导员，并于197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75年夏天，我已从连队调到营部党总支工作。

一天从场部学习回来，领导忽然找我谈话说，这次大学招生，我们有一个复旦新闻系进修班的名额，经研究，决定推荐你去学习。真是个喜讯！复旦新闻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、名扬海内外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。我们这个班是为培养市郊基层宣传干部而招生的，30名学员个个经过艰苦劳动的磨练。虽然学制只有一年（后延长了半年时间），但系领导还是很重视，选派了教

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为我们授课。在校期间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新闻史和采访、编辑、写作、新闻摄影等课程。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徐泽老师，陈韵昭老师讲授通讯等写作课，丁法章老师讲授评论课，两位老师都曾带我们一起去宝山、川沙等处实习和调研。当时教摄影的谢恩光老师在崇明长江农场手把手地教我们取景、构图、拍摄和冲洗相片，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我先后到原宝山县广播站和文汇报实习了4个月，拜著名的记者、编辑为师，懂得了办好报纸、广播站靠的是知识、智慧和勤奋。离开复旦新闻系后，我一直没有放

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为我们授课。在校期间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新闻史和采访、编辑、写作、新闻摄影等课程。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徐泽老师，陈韵昭老师讲授通讯等写作课，丁法章老师讲授评论课，两位老师都曾带我们一起去宝山、川沙等处实习和调研。当时教摄影的谢恩光老师在崇明长江农场手把手地教我们取景、构图、拍摄和冲洗相片，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我先后到原宝山县广播站和文汇报实习了4个月，拜著名的记者、编辑为师，懂得了办好报纸、广播站靠的是知识、智慧和勤奋。离开复旦新闻系后，我一直没有放

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

吴幼萍

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为我们授课。在校期间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新闻史和采访、编辑、写作、新闻摄影等课程。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徐泽老师，陈韵昭老师讲授通讯等写作课，丁法章老师讲授评论课，两位老师都曾带我们一起去宝山、川沙等处实习和调研。当时教摄影的谢恩光老师在崇明长江农场手把手地教我们取景、构图、拍摄和冲洗相片，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我先后到原宝山县广播站和文汇报实习了4个月，拜著名的记者、编辑为师，懂得了办好报纸、广播站靠的是知识、智慧和勤奋。离开复旦新闻系后，我一直没有放

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为我们授课。在校期间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新闻史和采访、编辑、写作、新闻摄影等课程。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徐泽老师，陈韵昭老师讲授通讯等写作课，丁法章老师讲授评论课，两位老师都曾带我们一起去宝山、川沙等处实习和调研。当时教摄影的谢恩光老师在崇明长江农场手把手地教我们取景、构图、拍摄和冲洗相片，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我先后到原宝山县广播站和文汇报实习了4个月，拜著名的记者、编辑为师，懂得了办好报纸、广播站靠的是知识、智慧和勤奋。离开复旦新闻系后，我一直没有放

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为我们授课。在校期间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新闻史和采访、编辑、写作、新闻摄影等课程。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徐泽老师，陈韵昭老师讲授通讯等写作课，丁法章老师讲授评论课，两位老师都曾带我们一起去宝山、川沙等处实习和调研。当时教摄影的谢恩光老师在崇明长江农场手把手地教我们取景、构图、拍摄和冲洗相片，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我先后到原宝山县广播站和文汇报实习了4个月，拜著名的记者、编辑为师，懂得了办好报纸、广播站靠的是知识、智慧和勤奋。离开复旦新闻系后，我一直没有放

十日谈

明起刊登一组

我与复旦新闻馆《身边的艺术节》

责编：徐婉青